

心香

■ 陈东辉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老杭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工作。在那里,有幸结识了许多学者。在那间面积不大然而充满墨香的阅览室里,在为学者们服务的同时,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知道了不少逸闻趣事。这段经历,如今想来依旧温暖,令人难忘。

以元明清文学研究而著称学界的中文系徐朔方(真名徐步奎,徐朔方是笔名,笔名名气更大)先生经常来古籍阅览室查阅资料。徐先生利用最多的是浙江、江苏以及安徽、江西各地的方志,因为他当时正在撰写《晚明曲家年谱》,方志是他重要的资料来源。那时图书馆的有关规定不像现在这么严格,由于徐先生要查阅的古籍品种特别多,数量特别大,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把他反锁在古籍书库里。

每天中午或下午下班之前,我们会主动提醒徐先生,请他从古籍书库里出来。不过有一次发生了意外,就是由于前面值班的尤钟麟老师临时有事跑开了,而那天下午前半段我刚好在馆里开会,忙别的事情,等我匆匆赶回古籍阅览室,尤老师跟我交接的时候,并没有专门告诉我徐先生被反锁在书库里,于是到了五点钟下班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古籍阅览室。幸好我刚走到图书馆楼下,突然听见图书馆的同事在大声喊我,我赶紧回过头,同事急促地说,有老师在古籍书库里面拼命敲书库的大铁门,说他还在里面。我于是两步并作一步,快速回到位于五楼的古籍阅览室边上的书库,用钥匙打开了门。见到有些焦急的徐先生,我连忙道歉,他却毫无愠色,反而宽和地说:“我在书库里面,你不知道很正常嘛,现在出来就好了。”

那时徐先生和我都住在校园(就是现在的浙大西溪校区)附近的杭大新村,有时下班之后我会陪徐先生一同走回杭大新村。在这一段大约十分钟的回家路上,徐先生常常会跟我谈一些学术界的逸闻趣事。

还有,当时我在老杭大图书馆工作中经常有大量杂事,与原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工作环境存在不小落差,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因此有时候我也会在徐先生面前流露出对前途的担忧。徐先生让我不要灰心,鼓励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也可以做一点研究,写几篇文章,说这些今后终归是有用的。当徐先生知道我既对版本目录学有兴趣,也对清代学术史有兴趣时,他说他的想法是,版本目录学确实是治学的重要基础,但他不建议我专门做版本目录学,而是希望我以清代学术史研究为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研究方向比较多,并不能说以清代学术史为主。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如果按照徐先生的建议集中精力研究清代学术史,那么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当然,人生没有如果。

徐先生生性率直,这一点在多位师友的回忆文章中均有提及,对此我也有体会。有一次我们根据馆里的安排,请经常来古籍阅览室的几位老师填写读者调查表。调查表中有一栏内容是“馆藏古籍能否满足您的需求”,大部分老师都填写了几句诸如“对我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之类的客气话,唯独徐先生只写了“勉强够用”四个字。其实徐先生的意见是较为符合实际的,随着我对

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情况有了更加全面、详细的了解之后,更加觉得徐先生的意见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其实对于专业读者而言,全国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图书馆和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古籍藏书都只能说是“勉强够用”,有的更是“不够用”乃至“完全不够用”。老杭大馆藏古籍(目前浙大馆藏古籍的主要来源)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其中徐先生经常使用的方志是收藏较多的,已经算很不错了。

历史系的宋史大家徐规先生也是古籍阅览室的常客。徐规先生为人非常谦和,说话时带着比较浓厚的温州口音,好在我基本上都能听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徐先生曾经两次被锁在图书馆的电梯当中。那时的电梯质量没有现在这么好,我也曾被锁过几次。徐先生第一次被锁在电梯里面时,幸好他抽烟,随身带着火柴,于是他赶紧划亮火柴,看清电梯中的按钮面板后按了报警铃,最后被电梯管理员救了出来。第二次是在某天中午下班之后,我恰好和徐先生同乘一部电梯,不巧的是电梯在二楼到三楼之间突然被卡住了。情急之中,我想起电梯管理员教过自己的办法,试着按了几个按钮,电梯门竟然真的打开了,只是轿厢离地面约有30厘米高。当时我也没有时间多想安全问题,而是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徐先生走出电梯。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有些后怕:万一操作失误出了意外,或者徐先生不慎摔倒受伤……后果真的不堪设想,那时的安全意识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好在徐先生平安无事,还连连向我道歉。

我在古籍阅览室还有幸结识了历史系倪士毅先生。我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语经精舍的若干问题,他对相关书目、人物相当熟悉,如数家珍,并且和蔼谦逊,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令我十分感动的是,虽然我跟倪先生并无深交,而且我是晚辈中的晚辈,但是当他在原有讲稿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暨教材《中国古代目录学史》出版之后,那时业已年逾八旬的倪先生手持该书,走楼梯来到位于五楼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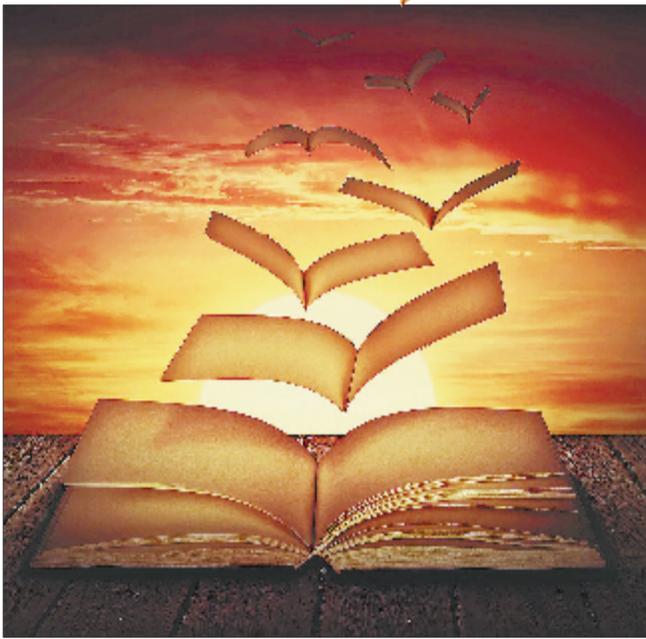
家中,非常客气地将大作赠送给我。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近年先后有两家出版社获悉我长期给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讲授“目录学”课程,曾主动联系我,约我写一本关于目录学通论的教材。我婉言谢绝了,除了诸事繁多,精力有限,况且已经有一本关于古典文献学通论的教材撰写任务在身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倪先生的同类教材水平颇高,自己恐怕很难超越。不同于徐朔方先生和古籍研究所沈文俟先生等曾经多次建议我专攻清代学术史(当然是替我考虑),倪先生和徐规先生等总是鼓励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文献学领域,同时提示我可以多关注浙江地方文化。近年来我在两浙地方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用力较多,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也受到了倪先生等的

影响。历史系的黄时鉴先生当时担任图书馆馆长,但是他也不搞特殊化。黄先生当时已经是研究元史和中西关系史的著名学者,因此有时也需要查阅线装古籍,不过却极少麻烦他人。我记得只有一次,他由于工作繁忙,托我代为查询了一条资料,其余情况下他都是亲自到馆查阅,并且从未提出“将线装古籍借回家”“延长阅览时间”这类让工作人员为难的要求。

当时常来古籍阅览室的还有古籍研究所的雪克先生。20世纪50年代,他曾协助图书馆到各地采选大量善本古籍,还依托镇馆之宝孙诒让稿本以及孙诒让批校本,完成了多项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雪先生对馆藏古籍的熟悉程度远超一般读者,他每次来从不翻查卡片或书本目录,而是直接报出所需古籍的书名。有一次我查完卡片后,告知他那本书库里没有,他却坚持说“肯定有”。当时我可以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觉得自己对馆藏古籍同样很熟悉,坚持说“肯定没有”。雪先生于是提出他自己去古籍书库寻找,没过多久,他便找到了那本书。后来我仔细核对后才发现,是卡片分类时

出现了差错。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雪先生对馆藏古籍早已烂



钩沉

■ 周孟贤

那年(壬申)早春,满山苍翠满眼艳红。心绪爽然的我,得悉湖州籍的元代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墓址,经考古专家考证,确认在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戏台山上(今人谓龙头山、龙洞山)。于是,在第一时间,我怀揣敬仰之情赶赴实地。

三轮摩托车在水乡的原野上奔驰着,扑面而来的是青山绿水、柳飞鸟鸣,一块块阡陌恰似一首首田园诗,一座座民宅宛若一首“诗”的标题,或楷体、或宋体、或扁草……一路上,忽浓忽淡的雾气弥漫着远近田野,我思绪激荡浮想联翩,在心中不住地翻阅历史的黄页,朦胧中,我期望眼前能出现那个工书法、精绘艺、才极高、气极爽、古赋凌厉顿迅、古诗涵蕴鲍谢、左右元代书风的赵孟頫老夫子,悠然踱步于西头村,在他的旧址前平视自己手种的黄荆,仰视自己手种的银杏……

车至东衡,我兴冲冲快步上山。这里翠竹摇曳,溪水叮咚,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油画般金黄了田野,身临其境,令

那年伫立戏台山

人心旷神怡。

我静静地伫立着。我看见这里竖有石人、石马、石羊和石虎,这里原是梅枝吐蕾、梅海一片的所在,而今满山是繁茂的竹林。沧海桑田,数百年弹指一挥间。前些年,村民在竹林里发现有两道石坎,在山的西面,发现石狮子、石夜壶(现在博物馆)等物,还发现七十座墓,墓地长约五六十米。

我一步步向山下的石马走去,只觉得思古之幽情——“古”了自己的步履。我轻轻地走着,生怕蹂躏被泥土掩盖的那段历史和匍匐在地的石马。我凝神静观,发现这匹雄健剽悍、清俊飘逸的,比例几近真马的石马,完全是元代风格的马,完全是赵孟頫画笔下的马……

望“马”低首,我陷入深思,赵孟頫是元画第一人,倘能早早展现和修复他的别业以及他的墓地,无疑将会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海内外人士,由此可大大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仰望蓝天,时卷时舒的白云波浪般向着空蒙的远山飘飞而去,于眺望中,一缕春光将我的目光带入了空蒙的历史天空……明人王世

贞说道:“文人画起始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这话客观地道出了赵氏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在书法方面,在诸体中他的楷书成就最高,与颜真卿、柳公权和欧阳询并称“四大家”,他在他那个时代便有“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之声誉……这位在八位兄弟中排行第七的杰出文人,还擅长古诗、考据学,精通音乐,并在篆刻艺术、鉴赏古器物上具有突出的成就。他的诗在同代可与元好问相埒,那个笔下山水古意超然的,生活习惯有着严重洁癖的元末著名画家倪瓒对赵诗以“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誉之……

不止于此!我还觉得他当年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主张,成功地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他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竭力强调画家以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他还提出以书法入画、“书画本来同”和“不借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窃以为赵孟頫的这些口号,

熟于胸。

古籍研究所的刘操南先生来古籍阅览室的次数虽然不算太多,但与多数老先生重点关注经部、史部、集部古籍不同,刘先生查阅的往往是天文历算等方面的子部古籍。刘先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他对母校和竺可桢老校长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堪称“求是赤子”!我当时对刘先生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情感受特别深,真的令人动容。并且,刘先生古诗吟诵十分拿手,学识渊博,善于言谈,精通骈文,杭州景区的一些碑文就出自刘先生之手。

中文系的王荣初先生当时已经退休多年,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来古籍阅览室。王先生说他要努力完成“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生前交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对夏先生的《词林系年》这一部重要著作进行增补。他辛苦查阅大量资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完成夏先生的遗愿和嘱托,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已经很难有人能够全心全意地真正做到(当然很多情况下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是非常令人肃然起敬的。

当时来古籍阅览室比较多的,还有历史系的龚廷明先生(后来担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何忠礼先生、梁太济先生、仓修良先生,中文系的邵海清先生、廖可斌先生,古籍研究所的崔富章先生、方建新先生,哲学系的洪波先生等。中文系的洪湛侯先生和历史系的杨渭生先生曾经长期在老杭大图书馆工作,他们两位反而不来古籍阅览室,大概他们在馆里工作时,已经把古籍书库中的那些“宝贝”牢记心头上。

校外读者也不乏其人,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梦生先生(毕业于老杭大中文系)、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张道勤先生(后来调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和寿勤泽先生(毕业于老杭大古籍研究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徐吉军先生(毕业于老杭大历史系)、中国美术学院的钱斌先生等,都曾到古籍阅览室查过资料。他们后来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成就。

古籍阅览室里也常有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身影。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古籍研究所所长姜亮夫先生的博士生王宏理(毕业后先在浙江省博物馆供职,后来调到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任教授)。他精通书法,当他看到古籍阅览室门口还没有任何标识后,便主动提出由他来题写“古籍阅览室”五个字(竖行)。他在宣纸上采用竖体字写好之后,尤钟麟老师和我请图书馆专门从事古籍修复的林崇煌老师将其裱在古籍阅览室的木门上,从而增添了书香气息,同时也便于首次来古籍阅览室的读者马上就能找到地方。可惜后来随着古籍阅览室大规模改扩建(2012年重新修缮后的古籍阅览室成了西溪校区十大文化景观之一,再后来的2020年底搬到位于浙大紫金港校区西区的图书馆古籍馆,硬件设施上了几个台阶,跟老杭大的古籍阅览室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张字体清隽雅致的题字早已找不到了。

上面提到的多位老先生已经作古,不过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或许这也是我虽然离开图书馆回到自己毕业的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任教已经超过三十年,但始终与全国图书馆古籍界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不只对中国书画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对当下书画的影响(甚至走向)也有着现实意义;也因为赵有着这些高度的、超越历史的、超拔的审美思考、审美眼光以及绝世才华,才有他的《洛神赋》《道德经》《吴兴清远图》和《红衣罗汉图》等书画传世之作,并有《松雪斋文集》十卷……特别是那幅盛名天下的《鹊华秋色图》,山雄峻,水灵秀,树宁静,意境优美,意趣超古,点点墨根根线条诠释了它的“倡古意,反近世”、学习晋唐北宋时代的优秀传统之画作……

眼前山幽幽、水幽幽、竹幽幽,浓翠淡绿入眼来!即便是小草,在艳阳下也格外精神。伫立山头的我,努力把目光够到市区甘棠桥畔名为孙衙头的、黛瓦白墙的赵孟頫故居,且回想儿时的我,每逢夏天游泳至对岸便走进赵氏故居,听蝉鸣叫、看炊烟袅袅、观童叟下棋……全然不知主人有多大名气,不知他是我七百多岁的世界文化名人,也不知他写我们湖州的《吴兴赋》是传世之作,是绝世之宝,只知道他叫孟頫,我叫孟贤……

光影里的教育篇

■ 吴重生

当镜头与教育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焰?在翻阅衢州高级中学老书记周晓天即将付梓的影像集时,我仿佛触摸到了一种答案。这部沉甸甸的摄影集,其分量不仅来自光影的重量,更源于其中所承载的教育灵魂——一种以美为舟、以爱为帆、以生命为航程的深沉情怀。它是一首无声的教育诗,每一帧画面都是灵魂的拓片,诉说着一位教育行者如何用镜头耕耘心田、唤醒春天。

周晓天曾言:“教师的眼里要有光,有爱,有美,有温暖。”这绝非虚言,而是他躬身教育数十载的肺腑箴言。他的镜头,便是这“光、爱、美、温暖”最澄澈的折射。犹记疫情肆虐的庚子春日,校园繁花似锦却空寂无人。他端起相机,将一树树樱云、一片片花海悉心捕捉,只为让在家中的学子能隔着屏幕触摸春天的脉搏。这看似简单的传递,却是师者大爱最朴素的注脚——当物理的围墙阻隔了脚步,他用影像架起心灵的虹桥。这绝非孤例,当粒粒粟粮在师生汗水浇灌下化为瓶中清油,当这份来自泥土的馈赠被凝入水晶镇纸赠予毕业少年,那“一颗油籽的花样年华”便成了滋养生命成长的寓言。镜头在此,是爱的延伸,是美的布道者,更是教育温度最熨帖的丈量。

他的影像世界,是“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这一教育哲思的生动实践。校园于他,绝非机械的知识工厂,而是一方供生命自由舒展、向美而生的沃土。他敏锐地捕捉着那些平凡日子里闪烁的精神光芒:校运会上健儿肌肉僵硬的拼搏瞬间,是力与美的交响;晚霞中红衣少女奔向远方的剪影,是青春追梦的图腾;琴房里少年日复一日击打爵士鼓的执着身影,是灵魂深处爆发的惊雷。更有那樱花树下少年忘情仰望的专注——那被周晓天偶然定格的一瞬,是生命对美的天然感应,是教育最期待唤醒的赤子之心。

霍尔的农事诗

■ 曾园

很多人看了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才略微改变了对农业的看法。以前对不少人来说,农业意味着落后与肮脏,是需要逃避的地方——别提花时间去了解或讨论了。

新罕布什尔州是美国农业衰败之州,更多的人了解的是与它同维度的明尼苏达州的天气——自然是因为那部更红的剧《冰血暴》——在剧里,寒冷有十多种意义,每一种都可以抽绎出来发展出一部剧情。桂冠诗人唐纳德·霍尔在《鹰塘》里说,新罕布什尔的“狗的语言中,表示松鼠尿的词有两个”。你去自然是开玩笑。他其实是想引诱你去了解新罕布什尔州,以及农业——有人听说过它的衰败,霍尔想强调的是,衰败并非不去了解它的理由。

《鹰塘》这部厚达三百多页的散文集,是我读过的“金句”最为密集的书。1975年建议他辞去大学教职(他曾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回乡的是他的妻子简·肯庸,新罕布什尔州桂冠诗人。肯庸的诗写奶牛、泥泞、草料、夏令营、青蛙、四月的杂物、遛狗、菊花、羊……这些,都在霍尔的散文中被再一次书写。现在,她诗歌中的“你”,我们知道是我们熟悉的霍尔了;而霍尔《鹰塘》中时常闪现的“简”,我们更熟悉了:简往自制面包里夹了厚厚的火鸡肉,慰问铲雪车驾驶员;简不顾成群黑蝇,奋不顾身地闯入花园干活……这对夫妻,也许就是法国的萨特与波伏娃,中国的钱钟书与杨绛吧。

新罕布什尔州属于新英格兰。一百多年前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景象》一书中明晰地指出:“伟大的新罕布什尔……到处都明显留下了农业歉收的历史记载。它必须被当作历史背景,其中可追溯的事实是人类在这里曾经大胆地做过实验,但是失败了。”

另一位、人们更熟悉的梭罗,隐居的瓦尔登湖位于马萨诸塞州,同样属于新英格兰。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在那里他只生活了两年,他主张躺平:他种豆子,不施肥,“也没有给它们全部都锄一遍草,松一遍土”。人们在地里劳动,他认为只是“虚掷光阴的损失”。他的观感是“这里的居民……从事着成千种惊人的苦役。”“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却困难了。”他问:“谁使它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他的建议又有几分钱实用价值呢?“不如诞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来喂他们喂奶……”(比“何不食肉糜”更荒唐的美国版?)

《瓦尔登湖》的序里说此书是一本“静寂的书,极静极静”,需要“安静”下去去读。《鹰塘》可不一样,随便从哪一段读

他将镜头聚焦于师生,聚焦于日常的褶皱深处,因为那里埋藏着生命最真实的律动与光华。快门声里,藏着心弦共振的密码。

周晓天的摄影之旅,亦是衢州高级中学生命教育与美育从理念萌芽到蔚然成林的忠实见证。他视影像为教育的“助推器”,坚信美具有“培根铸魂”的伟力。从“衢高十景”的精心遴选,到呼风唤雨石、索素奉献石的郑重安放;从首届赏秋节市民如织的盛景,到新校园里由叶朗先生题写的校训巨石巍然矗立;从南孔家庙移栽的银杏根植沃土,到孔子圣像的庄严揭幕……镜头默默记录着校园文化从传承到重构的壮阔航程。当油菜花海的“云写生”在特殊时期点燃六十幅水粉创作的激情,当校运会看台上少年掰腕胜利后自信的笑容瞬间传遍校园,影像便超越了记录本身,成为激发情感、凝聚共识、塑造灵魂的澎湃力量。它印证了周校长的信念:美育与生命教育,不在宏大叙事,而在于能否让年轻的心灵在日常的土壤里感知崇高。

这部《一树花开》的珍贵,恰在于它的朴实无华,没有炫技的构图,没有猎奇的题材,更没有追逐奖项的刻意。它是十五年晨昏交替间,一片银杏叶悄然飘落的轨迹,是无数个跃动身影的真诚汇聚,更是教师含情目送学子奔赴前程的永恒瞬间。这些影像,如同校园外隅那片自由生长的杂树林,以其本真的姿态,无声宣告着生命最本初的律动——存在的本身,已是壮丽诗行。周晓天的镜头,是温柔的犁铧,深耕于教育的田野;是深情的眼睛,凝视着生命的绽放;更是永不熄灭的灯盏,照亮学子奔赴远方的路。

光影无声,大爱留痕。当无数个被定格的瞬间在纸页间汇聚,我们触摸到的是一位教育者赤诚的灵魂图谱。这部影像集,是周晓天校长献给所有相信教育力量之人的的一份厚礼——它告诉我们,当教育者的心中盈满光、爱、美与温暖,他目光所及之处,便是繁花盛开的春天。

起,你都放不下来,要么开怀大笑,要么陷入紧迫的思考。

霍尔来到这个“最节俭的州”,从1975年生活到2018年去世,一共待了43年。1995年,妻子肯庸去世,她在此生活了正好20年。

新罕布什尔一百五十年来,人口增长缓慢。麦尔维尔提到过此地被“离奇地抛弃”。霍尔在获得桂冠诗人的致辞中说:“我亲眼看见了获得三项普利策奖的人去世后彻底遗忘,这可能也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希望我能在我的作品中活下来。”这部《鹰塘》重写新罕布什尔或农业。为此,他不惜成为“土地的奴隶”。霍尔斟酌天气每一撮尺度的细微差别:“三月,雪只会给人带来烦躁感。但十一月的雪是一种回归,是对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梦幻般的补偿。”“在八月未让人感到极冷的温度,在一月中旬却让人感到极热。”

新罕布什尔之所以“伟大”,也许是因为风景。大枫树好似点燃山坡的火把,每天早晨都比前一天早晨更骇人,“就像儿子超过父亲一样。”“裸露的花岗岩巨石,像是鲸鱼巨大的肩膀从灰棕色的落叶之海中顶起似的。”“嵯峨山的斜坡,带着它所有的颜色、阴影和纹理的选集,在屋后升起。”

好景色带来了消夏客、赏叶人与滑雪客。霍尔承认:“我们大多数看起来有新英格兰风格的城镇,靠纽约和新泽西虔诚财富的注入生存了下来。”苹果仍是新罕布什尔的主要物产,尽管其他农业已撤离并向西部发展。北方乡村的主要产业只剩下旅游业与庭院甩卖了。“我们……也许是有趣的乡巴佬,更可能被怀疑为乘机剥削的卖方。”

本人不是没有想过发展其他产业。他们以前生产糖,从糖枫树取树液,然后熬成糖浆。在1931年可以赚钱,那时“现金是甜的”。外祖母的帽子生意经营得也很不错,但被更快捷的交通毁了。现在,霍尔自己担任过不受欢迎的餐厅领班与拍卖师,“挣的笑声比钱多”。

霍尔不干外祖父的农活了。但抢劫过梭罗的土拨鼠也同样困扰他。这些低能的胖子“凭借数量、增援和呆笨方面的优势开战”。邻居们对俘获的土拨鼠束手无策,“有些人夜间将活的土拨鼠偷偷送到当地民主党的园圃里”,霍尔会对它们开枪。

留下来的人,少数因为无能或缺乏进取心。更多的人留下来是因为亲情和乡愁,但大多数人留下来是因为爱。“除了爱,便无别的住在这里的理由了。”从弗罗斯特(霍尔的领路人)的诗集《新罕布什尔》来看,他仍然认为新罕布什尔是最好的地方。